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3.001

毛泽东话语空间中的康德面孔

王振民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毛泽东对康德学说的批判和借鉴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准备、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青年时期毛泽东融汇康德主体哲学和中国哲学来探寻救国图存的大本大源;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批判康德辩证法及不可知论来批判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哲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通过对康德自然哲学、政治哲学的审思以及对康德哲学的整体性评价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可以说,康德哲学是毛泽东通达马克思主义以及进行理论斗争、政治斗争和阐明外交战略思想所借用的重要理论资源。

关键词:毛泽东;康德;面孔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3-0001-12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核心,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发展和繁荣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必须拓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域和出场路径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其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无疑是着力点之一^①。其实,许全兴先生早在多年前就指出,“国内的诸多研究者较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对毛泽东的影响和作用,”而较少关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对毛泽东思想有何影响和作用”^②。特别是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毛泽东确实多次提及康德,使得毛泽东与康德学说的关系问题受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效。但随着“泛史料意识”的增强,无论是对此问题的总体性驾驭,还是对其细节问题的深度耕犁都有待进一步拓展。笔者试图以康德哲学东渐史为研究线索,在充分挖掘易见史料的基础上,全

面系统探讨康德在毛泽东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心路历程中的出场方式及其价值旨趣,并以此为镜初步探究毛泽东是如何立足于中国实际问题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康德学说的。

一 作为启蒙学者的康德

提起毛泽东文本中的康德,人们马上会想到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下简称《讲授提纲》)以及其他不同场合对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和不可知论的严肃批判。但是,毛泽东还说过两段让人深感“意外”的话:“我相信康德的唯心论”^③与“我是相信过康德的”^④。历史地看,毛泽东所说的相信过康德,发生于青年毛泽东从思想上自觉进行“自我清算”之前。当时康德主要是以启蒙学者的身份呈现在毛泽东的理论视野。恩格斯这样评价康德等启蒙者:“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一切都受到了最无

收稿日期:2021-1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VSZ080)

作者简介:王振民(1972—),男,陕西澄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王立胜:《7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轨迹与未来展望》,《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6期。

②许全兴:《百年中国哲学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

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恩格斯对启蒙学者的革命性的看法尤其适用于康德。这是因为“‘批判’‘理性法庭’‘思维着的知性’都是康德特有的术语”^②。康德批判哲学所具有否定性的理论特质,对已经具有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意识,希冀通过融会中西哲学,探求“大本大源”,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实现救国存亡的毛泽东来讲,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一)青年毛泽东初识康德启蒙哲学

青年毛泽东初识康德是在就读于东山新式学堂之际,主要藉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是毛泽东初步认同并相信康德的时期。从毛泽东对《新民丛报》曾进行过“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③的情形可以推测,他应该阅读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尽管带有“以中注康”的色彩,甚至对康德哲学存在一些误读或曲解,但毕竟“这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康德生平及其思想的文章,对于国人完整了解康德思想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④。梁启超之所以要引进、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主要是基于以新学说开民智、新道德育新民和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以便推进社会变革的需要。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不仅认为康德是“德国学界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把康德视为“黑暗时代之救世主”,而且认为“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的康德哲学具有“进国民之道德,膺国民之智慧,使国民憬然自觉我族之能力精神至伟大”的价值功效,有利于改变“民族散漫,无所统一,政权往往被压于异族之手”的时弊^⑤。梁启

超对康德哲学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人为自然立法理念的推崇与张扬给毛泽东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青年毛泽东再识康德启蒙哲学

青年毛泽东再次接触康德哲学,主要发生在“一师”求学期间,特别是从1915年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定期讨论”之后^⑥。此时,康德哲学,尤其是他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成为毛泽东探究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的锐利武器。青年毛泽东之所以对大本大源这一思辨性很强的东西感兴趣,“显然与他当时的历史观及寻找救国之道的有关”^⑦。青年毛泽东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⑧这就首先需要“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⑨。其次要“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⑩,进而达到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可以说,青年毛泽东对救国之道认知所蕴含的理念与康德关于通过思想革命或启蒙把人从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造就遵从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准则的“新人”^⑪的思想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青年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忠告运动”“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而反对“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并不只是限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革命理论的影响。事实上,毛泽东在思想革命的激进性与社会政治革命的温和性或改良性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康德哲学被称为妥协哲学的主要根由——与康德启蒙观存在的“两种不协调的要求”^⑫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也正是那一时期受到中西哲学中倡导的以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②赵敦华:《康德道德—政治哲学的革命意义》,《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4期。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④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⑤《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5页。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⑦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⑧《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⑩《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⑪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⑫赵敦华:《康德道德—政治哲学的革命意义》,《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4期。

的行为准则追求历史进步的理念的多重影响,毛泽东才会把革命理解为“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①,以至于五四运动时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展现出来的革命理念中还掺杂着和平的、无血的思想倾向。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康德哲学的烙印就比较明显。近藤邦康认为,毛泽东批注中内蕴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这一思想支柱,无疑受到康德的影响。他指出,像“无个人则无宇宙”的批语,“正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谓的‘现象界即我们所认为的宇宙是主观的产物’”的语意表达;而“吾人唯有对自己之义务,无期于他人之义务”正是对康德实践理性部分内容的认同性表述^②。实际上,从“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③的批注还可以看到,康德的绝对命令及其先验性,既是毛泽东批评叔本华的利己主义观点的理论依据,又是毛泽东实现从“无我”到“贵我”思想转变的理论支援。这是因为在道德问题上,所谓“贵我”就是通过强调主观道德律令的价值和意义,把道德问题还归于个人,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反对外部的客观的强制。也就是说,康德的道德律令被毛泽东用来倡导个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压抑人性和自由的道德观。这也和康德哲学在中国初步传播的价值旨趣相吻合。此时,康德哲学对毛泽东“新的启发和帮助”主要表现在,其启蒙思想是青年毛泽东初步确立二元论世界观,走向以“个人解放”与“个人实现”为核心的激进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撑之一。

二 作为自然哲学家的康德

虽然星云学说是康德的早期思想,但依然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这不仅表现在他在

会见威尔科克斯时提到康德的星云学说,而且在其他场合还多次提及。比如,1964年他在谈论认识论问题时就指出:“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④1969年在同李四光谈及关于太阳系起源的学说时,他自言并不大相信苏联施密特的“俘获学说”,而觉得康德的星云学说“讲的还有点道理”^⑤。又如,在同穆萨·特拉奥雷谈及拉普拉斯时又提到康德的星云学说^⑥。毛泽东之所以会对康德的星云学说感兴趣,甚至赞赏有加,主要是基于如下原因。

(一) 康德学说在中国传播初期的显著特点所致

从西方哲学东渐史看,康德先是以自然科学家,其后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视野中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之所以优先关注康德的星云学说,其重心倒不在于星云学说本身,而在于其体现出的科学方法和精神。也就是说,康德星云学说的科学革命性意义让位于社会革命性意义,它此时扮演着两种功能性的角色:一是满足“启蒙者自我启蒙”与“改良派思想家自我改良的内在需要”^⑦;二是维新派构建社会变革话语,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开启民智,打破顽固保守派坚守的封建思想的囚笼、篱笆的科学依据。总的来说,康德星云学说是服务于他们从“政治上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⑧。因为康德星云学说所揭示的天体演化规律或宇宙形成的科学理论,有利于打破、动摇中国传统文化所内含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根基。像毛泽东曾经崇拜的康有为,不仅最先引进介绍康德星云学说,而且以其来论证宇宙天体的运动。这就使“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宇宙形成和运动的‘元气’说,第一次有了被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②近藤邦康:《长沙时代的毛泽东哲学》,艾晖译,《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7年第6期。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2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⑥陈晋:《毛泽东与“西学”》,《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

⑦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⑧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西方实证科学观念改造的可能”^①。而严复在毛泽东曾经阅读过的《天演论》中以“按语”方式对星云假说的“精义”——吸力和斥力的对立统一和天体的发展变化——的介绍,无疑也对毛泽东了解康德星云学说有一定的帮助^②。虽然毛泽东接触到康德星云学说较晚,但其蕴含的进化论式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内蕴的以循环论为中轴的历史观形成鲜明对照,这对初次接触这些知识的毛泽东而言是极为新鲜且振聋发聩的。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康德星云学说之所以能给毛泽东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星云学说的高度肯定是相关的。在此首先必须提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不仅是因为“在马恩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比较频繁的厚本书,当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而且是因为毛泽东从中受益良多,特别是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同《反杜林论》之间存在的“一目了然”的一脉相承关系就可略见一斑^③,同时还因为毛泽东在晚年把《反杜林论》作为恩格斯的“画像是应该挂的”重要缘由^④。因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康德星云学说的客观评价给毛泽东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就在情理当中了。从《反杜林论》的相关内容来看,恩格斯针对杜林在阐释世界产生的理论模式时极端“轻蔑”康德星云学说的观点,不仅明确指出,康德星云学说第一次动摇了自然科学史上那种“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是人类“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而且还认为康德星云学说在哲学上采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使以前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被“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⑤。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再次高度评价了康德的

《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他强调指出,康德的“星云假说”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个“天才发现”,不仅排除了关于世界“第一推动的问题”,推翻了过去保守的、形而上学的、“僵化的自然观”,而且还初步阐明了“关于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的观点”^⑥。恩格斯这些重要论述,无疑有助于毛泽东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康德星云学说在自然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过,从毛泽东研读星云学说的历史语境来看,与青年毛泽东主要把康德星云学说作为反对愚昧和迷信、倡导进化论的发展观的自然科学依据不同,康德星云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作为毛泽东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生成史的前理解知识。

(三) 与毛泽东晚年思考的问题相关

对于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多次提及康德星云学说的原因,除了毛泽东“对物质的构成和运动,对宇宙的起源……有着浓厚的兴趣,似乎要从根本上追问和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终极课题”^⑦,除了对过去学习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的回溯性说明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缘由。恩格斯对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为什么要“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的解释值得我们注意。恩格斯指出,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⑧。如果联系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出的关于“要研究自然

①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②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

③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153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415页。

⑦陈晋:《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三)》,《新湘评论》2016年第5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6—747页。

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的历史语境^①,此时,毛泽东话语中的星云学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一样,还具有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政治斗争的价值旨趣。其主要是籍此来突出事物存在生灭交替、变化永恒性的规律,“反对革命胜利后会出现无冲突状态或者共产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观点”,主张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和“变易”的思维来看待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存在的思想和实践问题^②。

三 作为知识论者的康德

毛泽东对康德的知识论(包括认识论和辩证法)早有接触,但只是自延安时期开始,才成为毛泽东关注的重要话题。在对康德知识论、黑格尔辩证法等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中,毛泽东不仅更精准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超越性,而且更深刻地洞察了革命实践中出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哲学根源和唯心主义性质,为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对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批判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不可知论并不陌生。一方面,经由梁启超、严复和杨昌济的著述,他已经初步接触过康德的不可知论。另一方面,经由马君武翻译的《赫克尔一元哲学》或者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海克尔认为康德的认识论是冲突的,即作为批判的自然哲学家或物理学者的康德的一元认识论与作为形而上学者或实践理性的教条主义的发明者的康德二元认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③。但无论如何,青年毛泽东以上阅读史的确构成了他进一步对康德不可知论进行批判性透视的前理解结构。而毛泽东之所以把批判重点锚定在不可知论上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是康德不可知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对象。虽然康德开启了认识论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奠定了现代认识论的基础,但还是留下割裂现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物自体存在却不可知或理性不能认识真理的悖论,导致无法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问题,进而无法实现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真正达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世界的目的。破解康德物自体的秘密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恩格斯不仅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新康德主义时就把康德哲学中的“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指认为是“最不值得保存下来的部分”^④,而且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更是明确强调,“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已经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借助恩格斯的文本着重从认识论上多次批判了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把世界‘二重化’,宣扬‘二元论’”;“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两者妥协,使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是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是“臆说”与“废话、怪论、狡辩、捏造”;主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应该立足于对其“不够格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从而“完全否定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以上这些毛泽东熟读的著作确实给他留下深刻影响。当他在《实践论》中谈到康德曾经面对如何解决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的对立、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就强调,“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不过,毛泽东所讲的实践既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抽象的道德实践,也与马克思所讲的实践范畴有所不同。他的实践范畴不仅包括生产实践,还包

①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王振民:《毛泽东话语空间中的海克尔之谜》,《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③赫克尔:《宇宙之谜》,马君武译,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32—24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61、177、162、168页。

括“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等实践形式^①。

二是不可知论是造成中国革命实践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认识论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以至于他晚年还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②。毛泽东认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功效已不是确证中国革命的将来图景,而是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维度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中国革命道路。在他看来,无论是别人给他扣上“狭隘经验论”的帽子的原因,还是革命理论实践中存在唯理论或怀疑论的缘由,归根究底都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领域存在的理论贫困或匮乏相关。1961年毛泽东在给外宾介绍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时就指出:“过去的错误,属于认识问题者居多,当时名之为教条主义,即不按中国特点办事,硬搬外国经验。”^③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洞察和积极反思。即使是对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分析,毛泽东也认为其主要根源在认识论领域或“主观认识”,即“认识不符合客观事实”^④。他认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翼”空谈主义)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不能从“彻底的认识论的辩证法”与“彻底的辩证法认识论”^⑤的高度——这无疑是康德认识论的重大缺陷——去把握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从实践辩证法的高度以实践为中介达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知与行彻底的统一,从而实现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科学认知。

三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侵蚀的斗争相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批判康德不可知主义的价值旨

趣层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西方哲学中不可知论的批判之所以主要对准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主要原因在于康德的不可知论是两大阵营对抗期间帝国主义国家“抵制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放毒”所采取的隐蔽手段^⑥,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其“荒谬绝伦地宣称客观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社会界)及其规律是不可知的,从而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使他们不能积极地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来推进革命工作”^⑦。此时,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主要服务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的。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把康德哲学视为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因而,对康德不可知论批判的落脚点不仅要“政治上揭露它的阶级实质及其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反动作用”^⑧,而且是为了突出康德先验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实践性的本质。

概而言之,从历时性的视角看,青年毛泽东主要汲取康德的认识论中关于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性思想、否定性的理论特质作为探求救国之路的理论资源,从一般唯物主义视角对康德认识论的局限性和唯心主义性质加以初步反思。而当毛泽东把马列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有机结合,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后,他不仅从认识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高度揭示了认识的运动规律,而且从认识论与逻辑学相一致的高度揭示了变革现实的实践在唯物辩证法认识运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性发展,进而以此为理论武器对康德不可知论进行了彻底批判。可以说,毛泽东开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他更深入批判康德不可知论提供了不竭动力源。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283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633页。

⑤孙正聿:《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⑥全增嘏:《不可知主义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

⑦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1页。

⑧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0页。

(二)对康德辩证法的评价

康德在解决认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辩证精神,使辩证法与认识论紧密耦合在一起,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对康德不可知论的理解、反思必然会牵涉到康德辩证法领域,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泽东首次明确批判康德辩证法是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下简称《讲授提纲》)中。他在谈及康德的“四种矛盾思想”或二律背反学说时就指出:“他说这些只是人的思想上的矛盾,实际世界里是并不存在的。依照形式论理学的矛盾律,这些矛盾乃是一种错误,必须加以排除。但实际上思想是事物的反映。事物无一不包含着矛盾,因之概念也无一不包含矛盾,这不是思想的错误,正是思想的正确。”^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别是以关于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理念为标尺的。毛泽东不仅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决定要素”^②,而且还“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③。即使从《矛盾论》本身看,贯穿始终的也是如何认识和研究、怎样对待和解决矛盾,即从“认识论”的性质上、意义上去表述和理解“辩证法”^④。这也是毛泽东在《讲授提纲》中批判康德辩证法的根本目的所在。他认为,由于二律背反“拘泥于两条原则外表上似乎相冲突的情形”,因而不能“透视到事物内部的本质”,反映“事物的真相”^⑤。

而在1964年和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中,虽然毛泽东也批评康德不能正确解释范畴内部的矛盾、冲突和范畴之间的正反合的演化的原因,但是他对康德的范畴表在辩证法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他说,康德“搞了十二个范畴,这

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⑥。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康德辩证法的认识是比较到位的。这是因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构建的范畴表,是他的哲学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尤其是其中的“三分法”,“可以说是辩证法的萌芽”^⑦。“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⑧。如果说,康德的自然观为破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那么,康德对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探究则为破除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打开了第二个缺口^⑨。这里特别要注意两点:一是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理论界对康德哲学也作过一些实事求是的评述,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氛围还是主要着眼对其认识论、先验论的批判,对康德辩证法不仅很少涉及,且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面来讲的。像毛泽东如此评价康德辩证法还是很少见的。二是这两次批评虽然间隔27年,但在总体价值意向上还是有共通之处,都针对的是康德消极的辩证法(即虽然承认思维或理性矛盾的普遍性以及矛盾双方对立的必然性,但最终止步于世界不可知)。像在同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中,他批评重点也是康德关于“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观点^⑩。

在此,首先要看到毛泽东对康德辩证法的肯定性评价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一致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特别强调康德在辩证法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他指出,康德对辩证法的贡献,不仅在于用“辩证的方法”,以“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的“精神”来“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和人

①竹内实:《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苍苍社1984年版,第244—245页。

②《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③竹内实:《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苍苍社1984年版,第199页。

④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244页。

⑤竹内实:《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苍苍社1984年版,第246—247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⑦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2页、第98—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⑨杨丽珍,毛华兵:《恩格斯批判康德哲学的逻辑演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①。而且康德第一次明确提出理性思维产生矛盾具有必然性的思想,特别是“二律背反”,是近代哲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以至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把康德辩证法作为“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重要成果之一,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当以继承了康德辩证法而感到骄傲^②。毛泽东则在《讲授提纲》中指出:“辩证论理的矛盾统一律,就在这个基础(康德的形式逻辑学的矛盾律——引者注)上面建立起来。”^③

同时也要看到,康德辩证法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重大成果之一,也是毛泽东通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理论资源。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关注“唯物辩证法的前史”之中的康德辩证法,是为了通过学习、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可以说,批判性学习包括康德辩证法在内的西方哲学,是毛泽东对恩格斯关于如何把握理论思维的辩证法以及对蔑视辩证法所造成严重后果警示的体悟。恩格斯认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④恩格斯还明确把辩证法归结为超越经验思维的理论思维,并强调离开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的科学研究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因为辩证法作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要想真正掌握和运用它,“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⑤。这也是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号召全党多学点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康德

如果说以上问题域学界有所涉猎的话,那么,关于毛泽东与康德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思想对话的问题则很少被提及。康德政治哲学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其思想集中表现在其晚年所著的《永久和平论》中。他之所以要建构永久和平论,是想把那种被“嘲笑为幻想”的、“期待一种永恒的、建立在一个作为世界共和国的多民族联盟之上的、和平状态的、哲学的千禧年说”变为现实^⑥。为此,他以理性命令为依托,从西方近代的国家主权观念出发,依借社会性和非社会的理性力量与非理想力量的双重作用,设想“成立一种国际联盟,调停每一争端,以维护永久和平”^⑦。

(一)毛泽东与康德政治哲学的初次交往

毛泽东接触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可以追溯至青年时代。他初次接触康德《永久和平论》也是通过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在介绍康德哲学时提及了康德《永久和平论》(梁启超将其翻译为《永世太平论》),并对其五大纲要进行了扼要介绍和简略评价。从梁启超称其为“造化之妙用”的评价来看,他颇为赞同康德永久和平论。当然,他借用康德永久和平学说着有其特定的价值意蕴:一是以康德之“政治论”为民主立宪制张目。他不仅明确了“此制最合于最初民约之旨”,而且认为其“可以巩固全国人自由平等之权理”。二是表达了试图以提升“民德与民智”的途径,或者是以“弭兵”而非“强力”的方式(康德把强力或动干戈称为野蛮时代的恶习)来实现社会进步^⑧。三是康德所描述的理想王国的反面恰恰是当时中国历史境遇——内无自由民主,外有诸强侵略掠夺——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对永世太平的渴望也反映出维新派的救亡之策已经无力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7页。

③竹内实:《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苍苍社1984年版,第24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436页。

⑥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⑦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95页。

⑧《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3—1064页。

然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是后来的事情,但梁启超所解读的康德政治哲学所内含的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差异很大的对国家、个人及其关系的看法,无疑会对初出茅庐的毛泽东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虽然毛泽东此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那时的他是如何看待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但是从梁启超对康德永久和平论的褒奖、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大同思想和康有为对世界大同说的极力倡导,可以推测此时青年毛泽东起码不会反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因为直到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他还坚信可以通过哲学的改造和普及,达到“太平世”的大同境界^①。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伦理学批注中,毛泽东首次对永久和平论或大同说进行了批评。当然,这与他后来在会见施密特时从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的视角来批判康德永久和平论有所不同。毛泽东指出:“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既有可能与他受到杨昌济秉持的以批判性阅读的精神来看待西方伦理学的理念有关,也可能与受到泡尔生在伦理学意义上阐发的“抵抗”概念、中国传统哲学中“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维的影响有关。

(二)毛泽东晚年对康德政治哲学的批评

毛泽东对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其中,最明显的一次是与原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谈话。从毛泽东晚年多次提及永久和平问题,以及他把施密特的外交策略界定为“康德派”的理想主义,并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等情形可以推测,他对康德的政治哲学是有所了解的^③。毛泽东通过对施密特所倡导的以共同防御条约为中轴、以“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立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

系”为基础的对苏战略的评判,表述了他对康德政治哲学的基本态度,即在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对永久和平的期盼只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④。

从康德永久和平论的逻辑理路来看,所有国家都采用共和制是根本前提。但这与当时国际体系中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情况相悖。在此情况下要实现永久和平必然“要求一种彻底的社会和政治剧变。而进一步的重要影响会使人们看到,这种抹净画布的尝试必然以惊人的程度引起专断、非法和暴力,以致永久和平和幸福意识形态幻象必然越来越回落到地平线上”^⑤。再从康德构建永久和平的道德底线——“凡缔结和平条约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均不得视为真正有效”^⑥——来看,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采取的“一面讲缓和、和缓,一面拼命搞扩军”的政策,实际上已经破坏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这一先决性条件^⑦。即使是康德本人也没有彻底反对战争这一暴力手段在实现永久和平过程中的作用。借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最终会走向一个“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⑧。更为重要的是,康德本人不仅意识到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即国家之间“彼此互相征服的意志或者说侵犯对方的意志,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用于防务的军备——那往往使得和平甚至于比战争还更加压迫人、更能摧残内部的福祉,——是永远也不会放松的”。而且他意识到永久和平只是一种道德实践理性的律令或道德义务,因而试图“通过所谓的欧洲的势力均衡而来的持久的普遍和平,只是一场幻觉罢了”^⑨。阿伦特也坦言:“如果他因这种‘道德义务’而忘记作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③王振民:《毛泽东话语体系中的黑格尔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

④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梅兆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294页。

⑤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编者前言第6页。

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1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

⑧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页。

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3页。

为旁观者的见解,那么他可能就像介入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许多善人——理想主义的傻瓜——一样。”^①为此,毛泽东才会说:“看来你是一位康德派。但理想主义并不是好东西!”^②

康德的战争观以及实现永久和平的主要手段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一方面,康德在战争问题上“完全追随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自然状态即一个战争状态”^③,也就是说,康德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结于人性的恶或“人的狂热”^④。另一方面,康德永久和平是以建立在理性之上的道德政治观为基础,它的愿景就成为一种“政治伦理”。这意味着,避免战争的主要手段是基于“道德的政治家”的善意,即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是否愿意改变他们的“永远无厌”的战争兴趣^⑤。虽然永久和平也是毛泽东的理想和愿景,他曾指出,我们“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⑥,但是在如何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问题上,他和康德是大相径庭的。一是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产生的根源在私有制,现代战争发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或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在于“把人分为阶级,建立国家”^⑦,而不是所谓人性善恶的问题。二是战争的内驱力要么基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各种矛盾外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所谓政治家的道德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有永久和平,也不是仅仅依靠人的本性及其道德命令就可以达到的,而必须以消灭国家和阶级为前提。

当然,毛泽东通过批评康德永久和平论的价值旨趣主要是为了告诫施密特不要被美苏,特别

是苏联,天天讲的“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⑧的口号所迷惑,争取和平应该建立在欧洲团结、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从毛泽东对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来看,虽然“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⑨,是一种“甜蜜的梦”^⑩,但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平态势却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这既是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特别是矛盾的同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体现,又是他运用“相对中有绝对”^⑪的辩证思维对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的具体矛盾进行审思的结果。

结语:“了不起”的康德

暂且不管近些年来学术界关于理解马克思是应该“回到黑格尔”还是“回到康德”的争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内确实存在“重黑轻康”的状况^⑫。不过,无论是与斯大林、日里诺夫斯基彻底否定康德哲学的态度相比,还是与20世纪60年代国内开展的对康德哲学批判呈现的“严厉斥责后简单地加以否定”^⑬的基本倾向相比,毛泽东对康德哲学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和理性的。“一位了不起的人”^⑭,就是他在回溯他与康德哲学50多年的交往史之后,对康德作出的总体性评价。

一是对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心物二元论的理性评价。特别是在1962年的历史情境下,他认为康德哲学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实是难能可贵的。的确,虽然康德哲学从体系上完全是唯心的,从本体论上是站在二元论的立场上的,康德的经

①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②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梅兆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③吴冠军:《重思战争与和平——霍布斯、康德、施密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重疏》,《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④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⑤万俊人:《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

⑨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梅兆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⑩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0页。

⑪《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

⑫丁东红:《百年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

⑬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9页。

⑭《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验可以说是主观的,但是康德并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他的本体论并没有摧毁客观实在。毛泽东对康德哲学总体性特征的客观评判显然是建立在他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即使从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的阅读史来看,经由列宁、德波林等人的著作以及苏联20世纪30年代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已经对康德哲学的整体性特征有了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认知。像列宁在毛泽东熟读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指出,当康德承认自在之物的实在性、“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身份或者说唯物主义的倾向出现的。当康德指认“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与“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是以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①。可以说,康德既不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像毛泽东在瑞金阅读过的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就把康德哲学称为二元论哲学,并认为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必定要导出主观的观念论,他方面必定要导出唯物论”^②。

二是对康德哲学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客观评价。无论康德哲学有什么样的时代局限,存在什么样的内在矛盾或张力,但不能无视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能忽视康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会见威尔科克斯谈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时,他不仅把康德作为黑格尔的先生,而且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③。在他看来,不批判性理解康德哲学,就很难理解黑格尔哲学,进而难以完全把握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难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不过,此时毛泽东提起

康德的意思不只是“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割断它和西方哲学史的联系”^④。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毛泽东的语意更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和改造”,而不在于说明“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启示和补充”^⑤。即使毛泽东清算过曾相信过的康德的唯心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旧唯物主义而言,它承认了人的能动性,尽管是“抽象地发展了”^⑥。康德虽然主张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但与其先前的一切哲学相比,它明确自觉地提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强调了人的意志或能动性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毛泽东一生比较重视意志、理想信仰在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中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的确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三是对康德哲学影响他的心路历程的总回顾。综观毛泽东与康德哲学对话史,康德批判哲学和心物二元论不仅是青年毛泽东“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进行自我思想清算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也是毛泽东进行哲学革命、伦理学革命,启蒙民众、开启民智、培育新民,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瑰宝”之一^⑦。特别是康德开创的主体哲学、星云学说及其内含的自然观和进化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一方面,康德哲学成为他体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革命性的坐标,另一方面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或缺陷,特别是康德的消极辩证法及其导致的不可知论、充满浓厚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成为他进行理论斗争、政治斗争,表达自己外交战略的理论工具。概言之,从青年时期相信康德到延安时期对康德的批判,再到晚年对康德哲学作出的中肯的总体性评价,可以印证陈晋所言不虚,即毛泽东对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是比较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缺席毛泽东哲学思想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②德波林:《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林伯修译,上海南强书局1932年版,第258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④陈晋:《毛泽东与“西学”》,《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

⑤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⑦《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1页。

的准备和发展过程^①。

此外,毛泽东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特别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念、方法,在他认知、解读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时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在初识康德之际,他还是在梁启超、杨昌济的影响下,侧重于以中国传统哲学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来注解或融合康德学说,从学理上来探求“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过,毛泽东后来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进行过批评^②。随着对袁世凯、康有为和孙中山治天下之道的反思,他侧重于以“双重改造”的融合范式,即以改造了的中国传统哲学同改造了的西方哲学相融合^③,也就是中西哲学融合的方法^④,初步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视角以探寻大本大源为立足点,考虑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路径。虽然青年毛泽东试图

通过融合中西哲学达到救国救民的努力落空了,但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对他后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一定的镜鉴作用。特别是从新时代我们思考和探赜习近平关于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的重大论断,贯彻和落实习近平关于既要“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又要善于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研究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有益滋养的重要精神来看^⑤,毛泽东以中西融合的实践智慧,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围绕中国问题,批判性吸收、改造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西方学说,汲取中外古今学说精华,构建富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和做法,无疑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学习并积极践行。

Kant's Faces in Mao Zedong's Discourse Space

WANG Zhen-m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contact between Mao Zedong and Kant's theory ra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 his youth, Mao Zedong combined Kant's subjec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o explore the great source of saving the state. In Yan'an period, Mao Zedong criticized the philosophical root of dogmatism in the Party by criticizing Kant's dialectics and agnostic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Mao Zedong expressed his own idea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Kant's natural philosoph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Kant's philosophy. It can be said that Kant's philosophy w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material used by Mao Zedong to understand Marxism, carry out theoretical struggling and political struggling, and clarify diplomatic strategic thoughts.

Key words: Mao Zedong; Kant; faces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9—100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4页。

④薛广洲:《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340页。